

傳奇·傳記

傳奇·傳記

徐海东将军

张 麟

参加过黄麻起义，从一个普通的士兵，成长为卓越的军事家。他一生身经百余战，九次负伤，带十七处伤痕。左腿为二等残废。他智慧过人，品德高尚，性格开朗，诚实、宽厚、正直。友称颂他“党性强、骨头硬”。一些老同志亲切地称他为：“窑将军”、“中国的夏伯阳”。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给了他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领袖、群众的领袖”、“最好的共产党员”、“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徐海东，这位卓越的军事将领，不幸过早失去了在战场上施展才华的机会。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他出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不久，就病倒在华中战场。一九四〇年以后，几十年里，他一直处于病榻。由于他性格刚强，具有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在同病魔作斗争当中，他一次又一次地抵挡死神威胁。当他还满怀着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希望同疾病作斗争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林彪、江青一伙为了篡党、篡军、篡权，把许许多多老革命看成眼中钉、肉中刺，一个个打倒。被称为“老病号”的徐海东，这也给扣上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受到残酷的迫害。徐海东刚正不阿，始终保持着一贯的气节。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在郑州逝世。

徐海东的，不是史学家编写的那种历史，而是一个大熔炉，不是小说家创作的那种神奇的故事。他不断地窑工出身的将军革命实践的记

录。这里写到的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领导人的活动，都是依据战史的记载，依据徐海东同志的口述，以及关于他的文章、报道、回忆录和档案史料。在整理文稿的过程中，笔者时时牢记徐海东同志生前多次当面叮嘱：“你们写历史，要写党，写人民群众，写毛泽东思想，不要把我个人写成一个什么样的英雄人物。没有党，没有人民，没有革命，我不过是个穷窑工！”

做革命的“老虎”战斗。

一九三一年三月，徐海东带领，当时红军团，升级到了红军第四军十二师。徐海东在二十三年多游击，如今脱掉了长袍，戴上了军帽，泥水中，尽管身上还不是一色整齐的军装，仍穿着红军的袄、蓝布裤，可是他扎上了绑腿，系上皮带，更派人把很象一个武装军人了。看到红军大发展，军部派来了许多人，有的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有的是参加南昌起义军的指挥员，有的还是留过学的——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生，一个个文武双全……徐海东高兴得笑颜常开，脸上那一对酒窝显得特别深了。一天傍晚，师部一位负责同志突然通知他，要他准备到三十八团去当团长。徐海东一听要离开老部队，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打心眼里不乐意。他觉得那里人生面不熟，不好开展工作，便跑去找师长陈赓。陈赓正在泡脚，看见徐海东进屋，笑着说：“才进门，趁水热，烫烫脚。”

徐海东拉着脸说：“我洗过了，想找你说说，我不去三十八团。”

陈赓一怔，问道：“你想干什么？那就来替我当师长，我正找不到个人顶替哩！”

徐海东只听说陈赓是个将才，参加过黄麻起义，北伐战争中当过第二方面军特务营长，却不知他爱开玩笑，以为师长疑心他想要当官，着急地说：“师长，你想到哪里去了，我不是想当官！革命嘛，哪能想自己，想到新部队人不熟。我……”

“谁和谁熟？”陈赓拉着长音说，“我来到这大别山，熟人更少，照你说那只好算干亲了。”说着穿上鞋袜，在地上走动着。

“我是想，人熟好工作……”

陈赓突然打断他的话严厉地说：“乡土观念！只想抱着老婆、孩子在寨门前转圈圈。这算什么革命分子！”

陈赓这几句话，说得徐海东很难受。若不是刚认识不久，真要和他大吵一顿了。他觉得师长这人，不留情面，劈头盖脸乱批评人，谁有乡土观念？谁又想抱着老婆、小孩闹革命啊！我徐海东闹革命，家都被抄了，我恋家？

徐海东压住心头的怒火，认真地说：“我徐海东？我是不想离开我那个老团。”

陈赓瞪大眼睛看着他，问：“你那个团？哪里的？”

徐海东说：“我是说，我和警卫二团人熟，那意思！……”他解释着。

陈赓不说话了，看着徐海东，微微地笑了。张笑脸带着几分顽皮，又带着几分歉意，说：刚才说话不客气，实在对不起。徐海

才感觉到师长的友好态度，也笑了笑，说：“我徐海东是个粗人，了解，我徐海东是个粗人，同志，会多多包涵的。”

“你是‘粗人’，谁是‘细人’？今后，我们都要多包涵。”说罢向徐海东做了个敬礼的手势，走了。

这一次短短的谈话，使徐海东一眼就看透这位师长的性格：陈赓是那么直率，那么爱开玩笑，玩笑之中，又含着同志的深情。徐海东自己就是这种性格，他自然也最喜欢这样的领导。

谁知，过了不久，一次接受任务，他又和陈赓师长谈了话。那一次，师长、政委召开会议，正研究着敌人某次“围剿”的部署。徐海东认为，这次打仗，会把他们这个团重要位置上，没想到，领导要他们去发动筹粮，还要他们设法去搞五百双军鞋来。

徐海东任黄陂区委书记、第五教导队队长，多是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

工作。婆婆妈妈的事不少，几乎天天都要和儿童打交道，他对这项工作虽然很熟悉，却有些厌烦了。他觉得干这个事，罗嗦、气而又难办，真不如在战场上冲锋杀敌痛快。他便当着师长、政委的面，气呼呼地说：“给叫我们团去干这些？”

师长却不动声色地说：“同志，这是革命分工嘛！不发动群众，不筹粮，我们吃什么？没有鞋怎么跑路！”

徐海东还是思想不通，又说：“为什么能派别的团去！”

陈赓师长在一旁发火了，说：“你这个虎，就是意见多！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是命令！通不通，三分钟，你再考虑三分钟。”

徐海东心想：考虑三分钟我也还是不通，可是他到底是一个经过北伐战争的老兵，懂得“命令”这两个字的分量，虽说是思想不通，还是向师长、政委打了个敬礼，说了声：“行！”便转身要走。

陈赓微微一笑，眯起眼睛说：“想好了！军人嘛，就是要服从命令。”

“命令我坚决执行。”徐海东回过头来请求似地说，“只是下一次再不要让我们去做……”

“什么，什么！”陈赓突然板起面孔，叫住徐海东，“这是有条件地执行命令，不行！……”

徐海东知道陈赓的脾气，他要是真发了火，话就难听了，便甩开大步，飞快地跑了。只听到背后陈师长又放声大笑。这笑声中带有同志式的温暖和友好的批评。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红四方面军在西安的七里坪成立，红军整编，徐海东被任命为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

这天，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来到了三十六团。他参加过广州起义和海陆丰地区的武装斗争，一九二九年秋，党中央派他来到鄂皖地区，不久他就听说红军指挥员中有一位人出身的“虎团长”，名叫徐海东，绰号“

虎”。由于部队一直是分散活动，徐向前起又是师长，因此他和徐海东不曾会过面。部队整编后，徐向前特意来看看三十六团的指战员，也看看这位工人出身的“虎团长”。

在徐海东心目中，徐向前和陈赓一样是一武将，是个很会打仗的人，听说他是黄埔第一期毕业生，更是增添了几分尊敬。他俩第一次面谈话时，徐海东发现这位总指挥言语很少，着个小旱烟袋，似笑非笑，不时地投来一种审视的目光。他觉得总指挥既不像陈赓那样爱笑，又不像有的领导人那么严肃。

“你读过书？”徐总指挥问徐海东。

“读了三年半！”

“唔，不算少！”徐总指挥微笑着说。

“我是个粗人。”徐海东坦率而又诚挚地说，“北伐前，我跟两个同志从武汉去广东，俩文化高，要去考黄埔军校，我是个粗人，黄埔军校的门进不去，就在韶关参加了北伐，在三十四团当兵。”

徐向前说：“黄埔军校的门进也好，不进也罢，你还不知，进黄埔军校的头一堂课，就填表集体加入国民党。”

徐海东说：“可是黄埔军校出来的，都会打仗呀！”

徐向前摇摇头说：“不一定。你没进过黄埔军校的门，没读过黄埔军校的书，不是挺会打仗的嘛！”

徐海东说：“我是瞎耍耍赶庙会，摸着走！这些年拉队伍是‘摸’，打游击是‘摸’，搞根据地还是靠‘摸’，一切都是‘摸’、‘摸’！”说着伸出双手，象弹钢琴似的，比划着。

徐总指挥很赞赏徐海东说的这个“摸”字。他虽然进过黄埔军校的门，做过武汉军校的教官，六大教程、步兵操典都学过，可是，如何指挥革命的军队，如何打仗，也是靠“摸”着共产党人。是啊，实践，就是一部革命的教科书，会冤在谁。

这里，徐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在革命战争教科书，千锤百炼，一个接一个的战斗，而是他增长着才干。

一九三二年二月初，漫天大雪。徐海东率领的红军在滇川县附近的豆腐店一带，与敌人展开了恶战。敌第二师、十二师、七十五师、七十六师等部共二十多个团，从河南向红军压来。徐海东和他的一团人，正好摆在敌人主攻方向，苦战一天一夜之后，到天亮时，前沿阵地终被敌人突破了。一营伤亡很大，营、连干部大部分负了伤。徐海东跑上前去，把棉衣甩掉，穿着一件白衬衣，在大雪中飞跑。战士们看见团长脱了棉衣，知道是到了决一死战的时候，溃退下去的同志又都跑了上来；负了伤的同志又都端起枪继续战斗。……

殊死决战，进行到第四天下午，敌人泄气了。此时红军总指挥部发出反击命令，霎时红军四面出击，正面冲杀，侧翼包抄，敌人二十多个团纷纷向后逃窜，他们在雪地上滚，泥水中爬，没来得及跑掉的二千多人全都做了红军的俘虏。徐海东听说部队抓了个团长，便派人把他叫了过来，想问问情况。哪知那家伙浑身湿巴，死也不承认自己是团长，一会儿说是副副，一会儿又说是代理团长。徐海东手一挥说：“你是军长我们也一样对待。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对我们的战术有何见解？”

俘虏叹了口气，说：“过去只知红军会游击战，现在领教了红军的正规战，你们能攻又能守！……”

徐海东脸上两个小酒窝一闪，微微一笑，挥手让人把俘虏带走了。不管俘虏话中有多少恭维成分，他觉得这一仗，三十六团确实向正规战跨进了一大步。这时，迎面来了师长。徐海东刚要举手敬礼，陈赓一把抓住他的手，亲切地说：“我该向你们三十六团敬礼，你们团打仗打得好啊！”

徐海东说：“是上级指挥得好，兄弟部队协同好，再加上老天爷的帮忙！”说着指指茫茫雪原。

陈赓又说：“这一仗，三十六团打出了威风了！”

徐海东心中有些自得，不客气地说：“样，干部、战士都锻炼出来了。若是……”

连伙夫都变成了好连长！”说着哈哈笑了起来。这笑声，既是高兴、洋洋得意，又表露着对师长的友情。

陈赓是个要求下级挺严的领导。他高兴了，和下级说笑，打闹，甚至抢吃抢喝。不高兴，听了不顺耳的话，他有时要生气骂一声。徐海东这次不谦逊的回答，竟没使陈赓恼火。他笑着说：“你先别说大话，我是要从你这个团调几个营、连长，要是不称职，我就要骂你这个老虎！”

革命的友谊，伴随着战斗的岁月在加深和发展。同志间彼此敬爱，往往是和共同的经历、性格和爱好相联系的。徐海东和陈赓同志从此越加要好。尽管有时两人会因为工作意见不同，甚至吵几句，红红脸，可是谁都不放在心上。徐海东总说：“陈赓是我的第一个好师长！”陈赓一提起徐海东，总联想到“徐老虎”、“臭豆腐”这两个绰号，赞叹又风趣地说：“蒋介石很怕这个‘臭豆腐’，一沾上就跑不掉了。同志们喜欢这个‘徐老虎’，他是革命的‘老虎’！”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摆在徐海东面前还有更难念的“书”，这就是“左”倾路线下，鄂豫皖省委作出的决议。决议说，国民党已经成了“偏师”，再进攻红军将由日本帝国主义出马了，红军要“不停地进攻”，准备“夺取武汉”。省委还决定，要“整肃内部”，“加紧内部的肃反工作”。徐海东对准备“夺取武汉”的话，根本不放在心上。他觉得：小小的力量，怎么能打武汉呢！这可能是哪个知识分子领导的头脑发热了。可是“肃反”的事，却使他心中无底。内部有反革命吗？谁又是“反革命”？开始听说抓了几个人，他没怀疑，觉得革命队伍发展得很快，混进几个坏人来，是可能的。可是，保卫局抓的人越来越多，把徐海东熟悉的几个干部也抓起来了。这使他开始怀疑“肃反”了。

一天，从方面军总部来了个熟人，偷偷地告诉徐海东说：“不得了呀，反革命越来越多，连总指挥的老婆——那个妇女会主任小程都

被抓起来了。”

那个张

“胡说！”徐海东不信。

“哪个敢胡说呀！这是听徐总指挥的警卫讲的。那天，总指挥叫警卫员找她去要双，警卫员跑到妇女会才知道的……”

徐海东哈哈大笑。他心里想：真是天大笑话，要是她也成了反革命，那反革命要蚂蚁还多哩！我就不信。

正在这时，师政委从上边开会回来，保卫局有命令，要把他这个师的两个指导员，一个排长抓起来审问；有人供出他们是“第三党”。徐海东一听，肺都要炸了。他正要质问政委，这时政委又递给他一张油印的单子，说：“上级布置，我们都要填这么一张表，都要接受审查。”

徐海东说：“你了解我，我了解你，这比填表更能说明问题么！”

师政委小声地说：“你还不知道？听说是白区入党的，有一半是靠不住的。”

“胡说！”徐海东心里骂着，拿着那张表走开了。

有一天，正吃晚饭，突然跑来一个人。人打着赤脚，穿一件破衣服，头上戴着一顶军的八角帽。他是从前跟着徐海东当自卫军的一个老兵，外号叫“铁蛋”。“铁蛋”一见徐海东，就蹲在地上，放声大哭。他哭了好一阵，才擦去泪，结结巴巴地说：“可……可……可到你来了！”

徐海东放下饭碗问：“‘铁蛋’，什么事这么伤心？你不是在当排长吗？”

“我找你来的……”

“找我？什么事？”

“铁蛋”不回答，又抹着泪哭泣。徐海东看他两眼直盯着饭桌，就问他吃饭了没有，他摇了摇头。于是徐海东叫人找来饭碗，盛了满满一碗米饭递给他，要他先坐下吃饭。“铁蛋”狼吞虎咽地扒了几口，这才说：“师长，我是跑出来投奔你的，上边要抓我‘反革命’！”

徐海东不信，笑着问：“为啥事抓你‘反革命’？”

“就因为我那个排跑了两个兵，我说是乱‘反革命’吓跑的。哪晓得，就这么一句话，也成了‘反革命’啦！”“铁蛋”说着又伤心痛哭起来。

徐海东很了解这个“铁蛋”。他是黄陂北人，三年前一个夏天，徐海东带领自卫军和团打仗，被包围在一个山坳里，正四处找路突围，从树丛里钻出个光屁股的放牛娃，他浑皮肤油黑发亮，自告奋勇为徐海东领路，把入重围的一小队自卫军，引出了虎口。那年只有十三岁，一再要求当红军，徐海东收留了他。在徐海东领导的自卫军中，许多人也都知道这个“铁蛋”。这样一个同志，怎么如今也成了“反革命”呢！

“你就留在这里吧！”徐海东思索了一番，“铁蛋”说，“没有人敢抓你。”

“那，我干什么呢？”铁蛋说，“我是跑出来的，我还是个党员，我……”

徐海东不假思索地说：“你是党员我知道，你是个排长我也听说过，就留在这里当排长。”说着他向师政委说：“我证明他是个好同志，证明他是党员，送特务连去吧！”

师政委当时没吱声，却把徐海东叫到一旁，说：“你这个同志也真是，这么办怎么行呢！要提高警惕嘛，怎么能随便收留一个开小差的人呢？还叫他当排长！”

徐海东说：“我了解他，不会错，是个好人！”随后又把“铁蛋”的情况说了几句。

师政委说：“那是过去，现在……”

徐海东说：“现在他要革命走投无路，我们应该收留。这样的‘反革命’，我徐海东要！”说着命令警卫员把“铁蛋”送到特务连去了。

冤死不如战死

一九三三年，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党继续推行。省委收到三月十日中央发出的指令，有些领导同志的头脑又发热了。就在郭家河战斗胜利之后，省委发号召、出通

报，说什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到了“大反攻时期”，“一切常备武装有组织的联合，都归编到二十五军去”；还提出要“消灭内部敌人”，“加紧肃反”，说什么如今到处都是“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AB团”……

徐海东名为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实际上他的工作位置仍在七十四师师部。他很少去参加省委和军部的会议，整天在部队里转悠。他期待着有机会再组织几次战斗。

一天，师政委从省委开会回来，吃着饭，以教训的口吻，向徐海东说，“如今，我们不能只想到打仗，要看到，我们的内部严重不纯啊！”

徐海东很不喜欢这位政委，这位政委呢，也讨厌徐海东。他俩时常发生口角，动不动就顶撞起来。徐海东觉得这个政委爱说大话，好随风倒，脑袋好象不是他自己的，常常听到风就是雨，自己没个主见。徐海东这时听到这个政委说“不能只想到打仗”，就不以为然地回了他一句：“当兵的就是要想到打仗。”

“打仗，我并不反对。”师政委又说，“要知道，内部不纯，那么反革命会从我背后开黑枪的。”

“内部怎么不纯，我看不出来。”徐海东又回了他一句。

师政委脸一板，严肃地说：“同志，要注意反革命！”

徐海东略带讽刺地笑了笑，说：“有反革命，好啊，没有反革命，要我们这些革命的做什么！”从他带笑的话里，听得出一种不满意的情绪。

师政委这会儿脸也拉长了，一本正经地说：“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现在，内部的反革命很多，省委已经决定要肃反！”接着又告诉徐海东说，“红军和苏区里，有许多从白区来的党员，这些党员，多数是不可靠的，特别是其许多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他们只要风吹草动，准会动摇的。”

徐海东听到“肃反”两字，头皮麻

他真想不通——内部到底有多少反革命。这鄂豫皖苏区四次反“围剿”之前，红军中就搞了“肃反”，军队和地方党政机关中乱抓“AB团”、“改组派”。不分青红皂白，硬是把许多好同志抓的抓，杀的杀，闹得军心、民心、党心都惶恐不安，再加上当时胜利冲昏头脑，说什么蒋介石部队已经是“偏师”了，今后要进攻红军，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亲自出马了。结果，敌人第五次“围剿”一来，落得这么一个结局。如今局面刚刚好转了几天，不趁这个机会去发展苏区，扩充队伍，却又抓起什么“反革命”来了，这不自伤元气吗！徐海东考虑到这是省委的决定，自己应该服从。不过从心而论，他觉得内部没有多少反革命。于是，他向政委说：“有反革命的话，就抓嘛！要是没有，我们可不能乱抓呀！”

“哪个会乱抓！”政委反感地说，“好人不会抓的，坏人就跑不脱！”

徐海东不敢和政委多争论，便走出屋，到连队去了。

省委的正式决议，很快传达下来了，真是火一样的言语：什么“起来，趁热打铁地起来”，“夺回中心城市”！“大反攻时期到了”，“行船遇顺风”，一定要夺回七里坪、新集、红安县”等等。

红军的干部、战士，听了这项决议，有的高兴，有的不解，有的担惊受怕。徐海东象坐在一只颠簸于风浪中的小船里，掌不稳舵，看不到岸。他这个一心只想着如何为革命打胜仗的军事干部，不知该怎么办了。

这天晚上，军部召开紧急会议，传达党中央和省委的指令：红二十五军要立即向敌人反攻，把夺回新集、七里坪、红安县、宣化店、商城、金寨等一切城镇，作为“反攻时期”的主要任务。第一步，先夺取七里坪。

会议开的不长，很快就确定了围攻七里坪的战斗部署。徐海东起初没有发言，直到最后谈到具体的战斗步骤和兵力配置时，他才

我们去围攻七里坪，那么红安方向的敌

八十九师增援上来怎么办？”

“打嘛！”有人马上回答说。

“我们兵力不够呀！”徐海东站起来，指着头说，“我们要围攻、要打援，还要筹粮，可眼下就这么一点兵力，要攻城，就没有打的，哪还能抽出兵力去筹粮呢……”他越说声音越高，情绪象是激动。

省委领导同志中有些人不耐烦了，不等徐海东说完，就打断他的话说：

“七里坪，是苏区的中心，消灭不了敌人把敌人撵走也算是胜利！”

“我们是有困难，可是敌人也有困难呀！”

“现在内部反革命猖狂，我们要一面来攻城，一面来肃反。”

徐海东似乎明白了，这不仅是一次军事行动，而且是一个政治行动。他虽然不掌握全局情况，但很想问问，到底内部有多少反革命。可是，“服从命令”这条革命军人的基本准则迫使他闭上了嘴巴。

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几天来从上面布置下来的一件件工作，在他的脑子里回旋，使他极为不安。到底什么叫“AB团”？什么是“第三党”？他没有接触过，也没有听过，至今还说不清，道不明。这时，他发现睡在身边的警卫员也在翻身，没有睡着，就问道：

“喂，你知道什么是‘第三党’吗？”

“不知道！”警卫员睁着两只大眼说，“据说它是一个反革命组织，以前我们也没有听过呀。副军长，你给说说，那‘第三党’怎么如今到处都是呢？”

“快睡吧！”徐海东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一天晚上，徐海东听说隔壁屋里正审讯“反革命”，就走了过去。这时，七十九团特务连指导员小朱被吊在屋梁上，审讯队的人员正在拷打他，师政委也在场。昏暗的油灯一闪一闪，映照在小朱挂着血痕的脸上……对小朱徐海东还是比较了解的。他记得，小朱刚十七岁就参加了革命队伍，当过皖西少年共产主义道委的宣传部长。这是个聪明、单纯、革命

十分坚强的同志，以往表现一直不错。“他怎么会是反革命呢？”徐海东站在暗处反问自己。他觉得不可能，几乎要发火了，但尽量压着自己，决意先听听这个指导员到底犯了什么罪。

“说，说，谁介绍你参加的‘第三党’。”通讯员在一旁大声吼叫着。

“没有，没有，我是共产党员。”小朱喃喃地重复说，“我不是反革命，我不是……”声音渐渐低沉了下去。

实在令人看不下去了。徐海东拉了拉师政委的衣袖，走到屋外，说：“这个同志我了解，他不是反革命！你看嘛，一点口供也没有。”

“这你就不懂了。真正的反革命，没有说口供的。不吐口供，更证明他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就是不说他的组织关系。”

“他参加了什么组织？”

“‘改组派’，有人供他是‘改组派’。”师政委看徐海东一个劲儿追问，冷冷一笑，说：“肃反是中央、省委的决定，你少管！我是省委委员，是政治委员，这是我管的事！”

在这个政委眼里，徐海东只会领兵打仗，是个不懂政治的人。徐海东的话，他几乎全听不进去。前不久，九龙缠顶战斗中，部队逮了一百三十多个俘虏，徐海东让战士把他们押往后方去，不料路上碰到了这个政委，他下了一道命令，把俘虏统统枪毙了。事后，徐海东问为什么要杀害俘虏，他却把脸一沉，说：“不杀敌人，那还杀哪个？我留着他们还要给饭吃，放了他们还会来打我们，不杀干什么！”……

夜已经很深了。徐海东尽管对这样的做法很不满意，可也只能躺在床上暗暗生闷气。那真是敢怒而不敢言哪！然而，他怎么都想不通：像小朱那样的人会是反革命。他决定明天亲自去找省委书记和军首长谈谈自己的看法。可是，第二天天不亮，他又接到命令，带一个团去截击敌人。三天之后，等他返回时，听说指导员小朱已被枪决了。临终时，小朱还喊道：“我不反革命！”直到枪响之前，他还一直不断地喊着“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的口

号……这些消息都使徐海东感到极度的痛心。

红军继续围攻七里坪，始终未能形成包围圈。敌人只是三面受围，另一面仍和后方保持着联系。大车小车源源不断地给他们运送给养。他们一天三餐，吃得饱饱的，红军部队的补给却十分困难。战士们不仅要忍受饥饿，还得承受肃反扩大化所带来的精神负担。眼看着全军要熬垮了，敌人两个师又步步紧逼过来。徐海东仍是每天率领部队去截粮。

四十三天的围困战，没有困倒敌人，红二十五军自己反而被困倒了。他们伤亡、损失三千多人。肃反扩大化，搞得人心惶惶，谁也不敢公开批评省委领导了。人们有气也只好憋在肚子里，或者是把愤怒和不平化作叹息。徐海东也一样，有话没处说。这一天，他接到通知，去参加省委召开的骨干会议。他带着一肚子的气，愤愤地走进了会场。

然而，会场里，仍是一片沉闷。主持会议的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端着烟袋锅，一口接一口地抽着。他让大家讨论今后部队的行动问题，徐海东见没人说话，就站了起来，说：

“我们围困七里坪，本来打算给敌人点厉害看看，结果怎么样？敌人吃得饱，睡得好，围而不垮。我们自己倒饿垮了！铜军，铁军，也经不起这样干啊！”

“是啊，我们原先的考虑不周密。”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插了一句。

徐海东继续说：“这样好的一支队伍，就这样垮了。领导上应该负全部责任。”

人们都盯着徐海东。有人打心眼里支持他，有人对他敢讲真话暗暗吃惊，有人却不同意他的说法，尤其是一些领导人……，没等徐海东把话说完，省委书记已经坐不住了。他站起身来说：“海东，你说什么？”

“领导上要负全部责任！”徐海东重复了这句话。

“是啊！我们是有责任！”沈泽民同志沉痛地说。

徐海东拢不住心头的火，越想越生气。

知怎么，突然站起身说：“历来，只有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只顾自己吃饱饭，不管战士的死活！我们可不能……”没等徐海东把话讲完，沈泽民同志脸都变色了。他走近徐海东，用烟袋杆指着徐海东的脸，气呼呼地说：“就你是无产阶级？你这个人成问题！”

徐海东被这种气势给噎住了，他还是头一次见到沈泽民同志如此动火。他准备把话说下去，只听得一声严厉的斥责：“你没有资格参加我们的会议，出去！”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徐海东说。

“出去！”又是一声吼叫。

徐海东想：这会是你通知我来参加的，我怎么没有资格呢？他十分恼火，一甩手，从会场走了出来。他站在门口想了想，觉得既然搞僵了，我还是应该把话说完。这时，从会场里传出来几句话：“他真是目空一切！我早就说他变了！”

徐海东听出这是他那个师政委的声音。还有什么背后议论呢，他不想听了，就匆匆离开了会场。

从党的会议上被撵出来，这是徐海东入党九年来头一次碰到的事。……他又想起了几天前，肃反委员会要他填一份表格，还交代他要把大革命失败后他怎样从武汉跑回来的事写具体一些，还有入党介绍人是谁，在什么地方入的党……再联想到其他的一些蛛丝马迹，他这才恍然大悟：啊，原来我也被怀疑上了，怪不得说我变了呢！

……

这时，他从衣兜里掏出那张要他填写的表格，视线停留在入党介绍人那一栏目上。他想起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吝积堂和李树珍……是啊，他俩一个在广州暴动时牺牲了，另一个下落不明。眼前没有一个人可以证明我入党的情况，这不陷入了被怀疑的困境么！怎样办好呢？是等着束手被抓，还是另找一条出路？前几天，有个被怀疑的干部，趁黑夜溜走了，可我无论何不能这样一走了事。革命军队是我唯一的出路。我常常对人讲，“活着是革命的人，死了

是革命的魂”，就是应该这样嘛！

他想着想着，不由得悄悄地掉下泪来。他怕出出进进的警卫员看出自己的心思，就拿着军帽盖住了脸。警卫员几次叫他吃饭，他只是嗯嗯一声，没有起床。

突然，特务连长进来报告说：“敌人攻过来了。”徐海东这才跃身而起，拿军帽擦净了泪痕，静下心来听了听。枪声来自东北方向，距离只不过两三里了。他估计是敌三十师、三十一师攻了上来，便赶紧冲出了门外，大声向警卫员说：“快去报告省委，快快转移……”

“好啊，来得正好！”他一边走，一边想，“趁此机会，打它最后一仗，战死算了。让敌人打死，还不至落个‘反革命’的臭名吧！”

徐海东刚出村，二二〇团和二二二团的两个团长同时跑了过来，他们气喘吁吁地说：

“副军长，不好啊，敌人……”

“马上组织撤退，赶紧占领……不，进攻！反击！”徐海东当机立断。他立即向两位团长交代了任务：一个团从左，一个团从右，向敌人背后包抄。

“这正面呢？”一个团长问。

“执行命令！”徐海东对他说了一声，便命令交通队、特务连跟他正面反击。

两个团长有点踌躇，他们不明白副军长今天咋回事。过去枪声一响，他的眼瞪得吓人，谁的动作慢了点儿，他就要破口骂人。可今天……

两个团长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小声地说：

“副军长今天怎么啦？”

“不好啊，我看他的眼是红的，好象心里挺难过呢！”

“你带领部队从左边插过去，我这个团贴着师部从右边往前打！”二二〇团团团长最后向二二二团团团长这样表示。

随着一阵阵激烈的枪声，敌人摆开了阵势，在开阔地里堆了黑压压一片。他们象蜗牛似的蠕动着，渐渐地攻过来了。徐海东带着特务连，巍然屹立在敌人的正面。眼看敌人临近了，他脱掉上衣，顺手把口袋里的一份文件交给警卫

员，嘱咐说：“一定要保存好！”接着，他摘下军帽，又脱下军裤，全身只剩下一条白裤头了。他抓过警卫员手中的战刀，说：“你们不许动！”然后向交通队的人一挥手，他便带头往前冲。

特务连的战士，不了解副军长的心思，见他赤膊上阵，不等冲锋号吹响，就高喊着“杀——”随着副军长冲上前去。

从左边展开的那个团，看见副军长一人当先，冲锋在前，团长、营长也带头冲了过去。

战士们见此情景，也一个劲地涌了过去。哪知道，这一下反而把敌人弄懵了，弄得他们一个个慌了手脚。

徐海东由于右腿负过四次伤，毕竟跑不过生龙活虎般的年轻战士。眼前又是烟雾弥漫，一片枪声，还夹着手榴弹的爆炸声，他渐渐地落在后面了。警卫员跑到他跟前，哭着紧紧地拉住他。徐海东用力一甩，挣脱开，又继续往前冲。他冲出去大概半里路，这时整个队伍已经冲到前边把敌人打垮了。

敌人一个旅被冲得七零八落，四百七十多人当了红军的俘虏。敌人两个师的进攻也就此停止了。

走下战场，太阳刚偏西。徐海东脑海里又浮现出那次自己被撵出会场的情景和那审讯人员拷打指导员小朱的场面……他想：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要是他们知道了我想死，更要说我有问题了。他意识到：一个共产党员，不能这样蛮干。幸好把仗打胜了。要是这一次受了挫，部队遭受了损失，怎能对得起党？“不应该，不应该！”他心里这样责怪自己。

这时，警卫员走到他身边报告说：“省委书记来了。”

徐海东问：“带了多少人？”

“没有多少人。”

“来就来吧！”徐海东躺在那里思忖道，“省委书记找上门来，肯定是找我算帐来了。这一回，我也可能要被捕了。”确实，肃反开始后，有些指挥员被当作“反革命”抓走，

就是从战场上逮去的。徐海东想：任他怎么办吧，我就不去迎他。可是多少年来“上级光临，出门相迎”的礼貌和习惯，使徐海东还是挺身而出，挪步往外走去了，这时，门外传来了话音：

“海东同志呢？”

“我在。”徐海东答应着迎出门去。

省委书记沈泽民身上穿着一件青布上衣，手上拿着一顶草帽，走路象阵风似的，一进门来，就拉着徐海东的手，眉开眼笑地说：“恭喜你，又打了个胜仗！”

徐海东由于有心思，没有马上答腔，停了一会儿，才说：“仗，是部队打的。”

沈泽民同志说：“是你指挥得好嘛！”他坐下来抽着旱烟，说了一会闲话，又说到上次省委会上的争论。他说：“你那次批评省委的话太重了。我对你的态度也不好。下次会上我再说一说。你这个同志呀，军事上行，就是政治上不强，省委开会扩大你参加，你总是常常不到会，这就不好嘛！”

“通知我开会，我几乎每次都参加了。”徐海东说，“偶尔次把有事不能去，也都请了假的。”

“是这样吗？”省委书记觉得奇怪，又说，“你们政委说，每次开会，他都叫你，你 just 不肯去。”

徐海东听了这话，顿时怒火上升。因为事实是上级每次通知开会，师政委就叫他“看家”，说“开会嘛，你就不要去了，我回来给你传达”。这个政委不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吗？徐海东真想当着书记的面，大吵一通。转念一想，他觉得这不利于团结，便只是把那偶尔次把没去开会的原因简单地说明了一下。

沈泽民抽着烟，听着，不时地点点头。他开始觉察到，徐海东在政治上也是个有见解的同志，不是他原来所以为的鲁莽的蛮人！

“我该走了，”沈泽民站起身，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块钢壳的旧怀表，看了一眼说，“晚上我还要开个会。看样子敌人退了，你要注意身体，好好睡一觉吧。”

“几点了？”徐海东问了一声，原来他自己的那块怀表，前几天由于链子突然断了，从衣兜里掉出来摔坏了。

“你的表呢？”沈泽民奇怪地问。他记得徐海东有一块怀表，那还是战利品呢！

徐海东一笑：“不小心，摔坏了，不走了。”

沈泽民说：“那怎么行，指挥打仗，要有表的，我这块给你！”

徐海东连忙摇摇头：“不要，不要，我再想办法。你不能没有它！”

“我再想办法。”沈泽民说着把那块表放在徐海东手上，走出了房门。

徐海东攥着那块怀表，仿佛一股暖流流遍了全身。他听沈泽民同志讲过这块表的来历：一九二〇年瞿秋白作为《晨报》的新闻记者，乘中东铁路火车到了莫斯科。当时苏联刚刚十月革命成功，经济十分困难，苏维埃政权号召捐献金物，瞿秋白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仅有的一块金壳怀表献出来了。苏维埃政权办事人，为表达对这位中国同志的友情，回赠给他一块钢壳怀表。从此，这块怀表，一直伴随着瞿秋白同志。一九三〇年九月沈泽民同志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瞿秋白为表达对沈泽民的友情，便把这块来自莫斯科的钢壳怀表，送给了沈泽民……

真正的友谊和谅解，并不需要多少好听的语言来表达，也是任何贵重的物品换不来的。徐海东看着这块普普通通的钢壳怀表，他对沈泽民同志有了更深的了解：他是一位关心人、体贴人、重友谊的同志啊！

徐海东不但再没有想到去死，冷静下来之后，反而觉得自己的举动幼稚可笑了。一个军事指挥员，怎么能那样做呢！这不是拿着打仗赌气吗？！

没过几天，鄂东道委书记徐宝珊见到徐海东，拱手说道：“海东，这一仗，你指挥得好啊！”

“当时我想拼一场，死了算呢！”徐海东说，“现在来看，也真对不起党啊！”

“什么？”

“我那时心里想的是：冤死不如战死！”徐海东用手指着脑壳说，“看来，这里头就是有问题哩！”

徐宝珊经他这么一提，自然知道事情的原委，便叹了口气说：“肃反，肃反，没有肃着反革命，肃着自己人，给我们的教训太深了。真正的反革命自然有，你徐海东打的不就是反革命么，怎能怀疑到你头上去了呢？昨天沈泽民对我说：‘宝珊，我不死，不准有人再说海东同志有问题。哪个说他有问题，哪个自己就有问题。’你就放心好罗，我也是这样看的。”

徐海东听了这几句暖心的话，一肚子的怨气全消了。他拉住徐宝珊的手说：

“宝珊，我是个粗人，说话不讲方式。我在党的会议上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别的用意。你想想看，围困七里坪以前，我们的队伍有近万人，现在只剩了四千多人了，多叫人心疼啊！……”说着，徐海东伤心得落泪了。

“教训太深了！”徐宝珊连着点了点头，停了一会儿，象是劝慰又象是鼓动，“不说这些了，我们还是要把队伍重新整顿、充实起来的。”……

分手的时候，徐海东想起要他填的那份表格，向徐宝珊说：“请你告诉省委，我入党的情况，现在没法找到证明人。”

“海东，你不要多心了。今后有谁要说你徐海东是反革命，你就说他是反革命！”徐宝珊安慰道。

徐海东这时从衣兜里掏出只填了半截的表格说：“我把它交给你吧，以前的入党介绍人找不到了，算我从北伐军回来入党的也行！”

徐宝珊说：“不要再说这些了，你的行动，就是最好的证明嘛！”

“青山大学”出奇兵

一九三四年三月，春暖皖西，山绿花红。徐海东和郭述申为迎接新的斗争，便率领部

从外线又跳回皖西的中心区——葛藤山一带，决定进行休整。

这一天，部队刚刚停下，敌五十四师一个旅、七十五师一个旅，从南溪、汤家汇分头合击过来。

徐海东向政委郭述申同志说：“看来不打个大胜仗，我们的屁股坐不住呀！”

郭述申说：“是这样哩！眼前敌人两个旅，我们要是吃掉它一个，剩下的敌人就会老实了。”

他们分析了两路敌情之后，定下决心：这一次把嘴张大一点，吃掉南路五十四师那个旅！

三月三十一日夜晩，五十四师上来了。徐海东命令一个营阻击北路敌人，其他部队集中在南路。第二天天刚亮，眼看敌人就要发动进攻，徐海东又命令两个营跑步向葛藤山西南的小石家沟前进，迂回敌人后侧。这两个营沿着一个突出的山梁，一直跑到山顶后，留下一个排固守，挖工事，其余的又顺着荫蔽的山沟，悄悄地向敌人摸去。

战场，是军事指挥员勇气和智慧的比赛场。徐海东常说：“要指挥好自己的部队，必须同时调动敌人。”他那两个营沿着山梁一跑，一下子就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小石家沟的山头上

去了。

敌五十四师代理师长刘树春，是国民党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当过十三年的团长和四年的旅长。他妄想和徐海东决一死战，捞上个彩头，好把那“代理”两个字去掉。他哪里想到，徐海东已给他摆下了迷魂阵，刘树春正指挥全旅的主力，扑向小石家沟山头。徐海东率领的红军主力却突然出现在他的背后两翼，这真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红军那激烈的枪炮声，使刘树春一下子乱了阵脚。

战斗仅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红军便活捉了刘树春，还俘了他的一千多官兵。敌人死伤不计其数，剩下的也都逃命去了，两个多团就这样彻底完蛋了。这是红二十八军在皖西反“围剿”作战中的一次大胜利！

战斗结束后，刘树春被押送到徐海东面前。这个“保定”出来的正牌军官，垂着头，不再趾高气扬了。一开始，他不吭声，过了片刻，忽然恍然大悟似地问道：“徐军长，您是黄埔第几期的？”

徐海东摇摇头。

“那您是‘保定’的？”刘树春不知趣地还问。

徐海东这才明白了，这个家伙满脑袋装的



是“黄埔”、“保定”。在他看来，不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就不会带兵；不是保定军校出来的，就不能指挥打胜仗了。

刘树春见徐海东不说话，认定他就是“保定”的同学，便又问道：“军长，您是‘保定’第几期的？”

徐海东火了，眼睛一瞪，说：“我既没有听过‘保定’的课，也没入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生！”

刘树春低下头，想了一会儿，又说：“敝人学识浅薄，不知青山大学在何处？”

“喏，就在这里！”徐海东手指着门外的远山近岭说。

刘树春点了支烟，有气无力地回答完徐海东的问话，最后又怯生生地说：“敝人有个问题，百思不解，不知当问不当问？”

徐海东说：“可以问。你说吧！”

“你们苏区的红军，房无一间，粮无一颗，你们到底是怎么……”

“你倒好意思说出口！”徐海东突然站起身，气愤地打断他的话，“房无一间，那是你们烧的；粮无一颗，那是你们抢的！你们还骂我们是匪，你们才是真正的匪！你们以为这样能灭掉红军，对吗？告诉你，这是永远也办不到的！”

刘树春吓着了，有点发抖，连连说：“请原谅，请原谅，这些都不能归罪于我。我是个军人，军人只懂得服从命令……”

敌人听说五十四师一个旅被歼，刘树春被俘，又吃惊又害怕，暴跳如雷，立即集中四十七师全部和五十四师、五十五师各一个旅，共十多个团的兵力再一次围攻过来。徐海东指挥红二十八军，与敌人先头部队激战了一天。夜晚，部队转移后，进入了深山。于是，这支红军队伍里的每一个指战员继续在“青山大学”里深造着……

徐海东和红二十八军在皖西战斗了一冬一

春。

一九三四年四月初，徐海东和郭述申率领

全体指战员，即三千多名干部战士，从皖西转到鄂东，在商城东南的豹子岩，与吴焕先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主力会合了。

……

红军在豹子岩又进行了一次整编。这次整编，把红二十八军又编入红二十五军。省委决定，由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在整编后的那几天里，军长徐海东沉默寡言，常常一个人坐在屋里想心事。他不象政委吴焕先那样爱动笔，往往一边想问题，一边就把得出的结论留在心头。

“我们再不能象以前那样蛮干了！”这是他留在心头的话。他想得很多，想到大革命失败后那风风雨雨的年代，想到他个人拉队伍、搞暴动的一些事，又想起红四方面军走后，沈泽民和省委的其他同志收拢零散部队重建红二十五军的艰难情景。是啊，部队曾经发展到一万多人。可是去围攻七里坪和军内搞的那个肃反扩大化，把这支队伍折腾得只剩下四千多人了，过皖西的路上又被敌人冲散，几乎垮了。他想，如今部队又整理起来，无论如何不能让这支队伍再受损失了。最近省委决定要整顿纪律，要加强政治工作，要健全政治领导，要加强基层的党团组织，要恢复士兵委员会……他从内心拥护。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军长，肩上的担子是蛮重的。他给自己订下三条守则：

第一，要练好兵，使部队会走，会打；

第二，要掌握好随时变化的敌情，真正做到知己知彼；

第三，要坚决克服掉自己身上的军阀作风。

他把这些不成文的守则，全都记在心上。每天晚上休息的时候，他都要对照这几条，想想做得怎么样。他感到对他来说，最难的是改掉打人和骂人的毛病了。平时他能和干部、战士有说有笑，可是枪炮一响，他总是管不住自己的手和嘴。

一天夜晚，他睡下了，又突然坐起来，问正在一边洗脚的警卫员：

“听说许多人怕我，是吗？”

“是的。”警卫员说，“人家说了，平时

你的脸露着和颜悦色，有说有笑。上了战场，你的脸就变得难看、吓人了！”

“还说什么来着？”

“还说，”警卫员故意拉着长声，“军长呀，平日挺和气，是个好军长，但是一上战场，就变样了，变得可凶了！”

这个警卫员，是刚从特务连调来的一个班长，外号叫“楞头”。个头大，说话不紧不慢，一句话落地，象块石头，能砸一个坑。徐海东挺喜欢这样的人，又问他：

“你怕我吗？”

“不怕！蠢种、草包才怕你呢，打起仗来，我不是蠢种！”

徐海东笑了：“你是不用怕我，我这个老虎，你要晓得，从来不吃好人哪！”

“唉，有的怕死鬼，你就得狠狠地骂。”楞头说，“只是不要拿马鞭子抽啊！”说到这里，他眨巴眨巴眼睛解释道，“马鞭子是抽马的，你用它抽人，不等于把人也当作牲口了吗？”说完，他忍不住嘿嘿地笑了。

徐海东不但没笑，反而沉下脸来。是啊，楞头的话，真象块石头，落到他的心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这也难怪，多少年来，他马上马下，手里总攥着条马鞭子。战场上，不少人挨过他的鞭子。抽着了怕死的人，他不心疼，让勇敢的人挨了鞭子，事后他也常常后悔。他小时候挨过地主崽子的揍；当窑工学徒时，挨过师傅的打；在武昌当兵那阵挨过班长、排长的拳头。他这动不动就骂人、打人的坏习气，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养成的。凡是挨过打的人，都尝过那滋味，即使皮肉受苦时间不长，心里却总结着一块疙瘩。他是个出身很苦的“泥巴人”，闹革命才当了干部，成了高级指挥员，怎么能忘掉这些呢！对，一定要改掉这军阀习气的坏毛病！虽然他这样想过多次，也常常暗下决心，可是，总没有象戒酒那样坚决。如今要整顿部队纪律，他觉得非改不行了！

在豹子岩一带，部队一边进行整顿一边练兵，犹如龙腾虎跃，异常活跃。徐海东一天到晚都在连队里转。看到干部、战士情绪高昂，

他心里从来没有这样愉快过。

就在这时，敌人围攻的准备又加紧了。蒋介石调来东北军，委任东北军的少帅张学良为鄂豫皖三省的“剿共”副总指挥。限东北军“三个月之内”将这一带的红军彻底消灭，“永绝后患”。于是，东北军十五个师又三个独立旅，共七十多个团，把鄂豫皖地区划分为六个“驻剿区”和一个“护路区”之后，采取稳扎稳打，步步紧逼的办法，向红军压了过来。

徐海东和吴焕先率领着红二十五军，为了避强击弱，便声东击西，与东北军展开了“推磨”战术，打起运动战来了。……

长岭岗战斗胜利之后，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又南下罗山、黄陂、孝感交界的地区，声东击西，大踏步地前进。八月初，忽然转向皖西，使敌人的多次合围计划完全变成了几张废纸。

八月下旬，徐海东率领指战员们又转战到商城、六安、英山间的广大地区，在郝集击退敌十一路独立旅的进攻。八月三十日，他们逼近了英山城。此刻，英山城内一片惊慌。省委提出要攻打英山，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徐海东在英山城下，经过周密的侦察，发现敌人早有防备，工事坚固，便撤兵回到军部驻地杨柳湾。

省委领导同志见部队从英山城下撤了回来，觉得不可理解，马上召开会议，讨论此事。会上，有人质问徐海东：“为什么不打？现在要扩大影响，就该打英山！”

徐海东摇摇头说：“这个英山，就是打不得。城里敌人除四十七师一个主力团之外，还有十几个民团。他们碉堡坚固，防守严密。我们仅侦察了一下，就伤亡了二十多人，若冒险硬攻，必定要造成重大伤亡。”

“打仗，哪有不伤亡人的。”有的人批评说，“只考虑伤亡大小，不从政治上着想，就是机会主义！即使伤亡一二百人，能攻下英山来，影响也是大的。”

“什么？用几百个战士的鲜血和生命，攻下一个英山城？我徐海东决不干！”徐

一下语气，又笑着说，“打仗，就是要找机会。找机会，不能叫机会主义，冒死硬拼可不是马克思主义。”

会议讨论了一番，为扩大红军影响，搞些物资、弹药，推动东北军抗日，省委多数同志还是主张打个城下来。徐海东闭上眼，思索、算计了一会，忽然睁开亮晶晶的那双眼睛，说：“一定想打个城，搞点物资，那就去奔袭太湖。太湖城从前是一个府，是安庆的大门，攻下它，影响比攻下英山还大！”

新的战斗方案一提出，省委和军部一些领导人都冷静地考虑起问题来了，随之，会议的气氛也就平静下来。有人看地图，有人计算路程，说那里离这儿大约还有二百多里路哩。

“这是舍近求远呀！”有人还是不同意。

“正因为离我们远，太湖城里的敌人才想不到我们会去攻打它。”徐海东胸有成竹地说。

过去讨论军事行动，总是省委书记和政治委员最后说了算。现在党内民主生活好了，书记和政委都能尊重大家的意见。于是，会议最后通过了徐海东的提案：放弃攻打英山，去袭击太湖城。

九月三日下午，部队乘着徐徐秋风，开始急行军。走了一夜，天不亮赶到了太湖西北方向的回龙湾。为了麻痹敌人，徐海东命令部队白天隐蔽、休息，准备晚上继续急行军。

许多干部、战士，对放在近处的英山城不打，思想也不通。一些人在班里埋怨、发牢骚，尤其听说夜里还要走一百三十里，就纷纷议论开了：

“我们这个军长，真是属老虎的，就是喜欢爬山、跑路。”

“我们可宁愿打死，也不愿走死！”

“……”

批评、怨言，徐海东并不放在心上。他只谋算着怎样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他睡了半天，下午又率领先头部队走了。他相信自己这支部队的行军能力，一路上不断传出命令：“加速前进！”

路远天黑，部队快速奔向目的地。

太湖守敌，是安徽警备旅的一个大队和小部分民团。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红军会突然兵临城下。半夜里，枪声大作。许多人还没钻出被窝，就当红军的俘虏。

天一亮，红军就肃清了太湖城里的残敌。这次行动，红军仅伤亡四人。战士们押着俘虏，清点着大批军用物资，脸上都挂着笑，两夜急行军所带来的倦容也都一扫而光。

这时，太湖城内外的群众，一片欢腾。附近几个县的贫苦农民闻讯后，也都纷纷起来抗捐、抗税、打土豪、抓劣绅、分粮、分盐、分衣服……

徐海东随着几个战士，在城里看了看县政府，又看了看安徽省警备旅驻过的营区。突然，他看到一个军用仓库里存放着许多雨伞，高兴地叫了起来：“好东西，好东西，快快派人收着。”

“我当什么好东西哩！”警卫员楞头说，“原来是伞，又不下雨，要它做什么！”

“你懂什么！”徐海东生气了，骂道，“你只懂吃饭！一把伞等于一间小房，知道不知道！”

有经验的干部，都体会到军长的话对，野外露营，下雨有把伞，真比什么都宝贵。行军路上遇了大雨，有一把伞，就能使上身衣服、背包不湿！于是，一会儿，许多干部、战士都装备了雨伞！

“敌人大部快追过来了！”侦察员报告说。不一会儿，一些群众也都陆陆续续前来讲了这件事。

徐海东考虑了一下，决定率领队伍立即撤出太湖，转到陶家河地区去练兵、开展群众工作。

哪知，刚撤出城外，徐海东在路口和一个干部正谈着话，坐在那里就闭上眼睛睡着了。警卫员看到太阳正从西边射来，便悄悄地给军长头顶也遮上把伞，让他睡……是啊，这两天两夜，军长实在太累了。

征 途 上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夜晚，徐海东和整